

# 9 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纪宗安

中华书局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公元 9 世纪以前的中亚北部为时空范围,论述围绕东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这一主题,涉及到:1. 从远古时起,在这一地区就已见东西文化交流的端倪;2. 塞种、匈奴等早期游牧民为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3. 丝绸之路经过中亚北部地区路线和交通网点的考释;4. 公元 5 世纪以降至公元 9 世纪,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突出了这一地区的重要;5. 粟特移民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活动和历史作用;6. 公元 6 世纪至 9 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旨在论证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希冀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更好地开发大西北,促进我国与西邻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一点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亚北部地区的远古文化 .....	(23)
第一节 中亚四至及它的北部地区 .....	(25)
第二节 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 .....	(34)
第二章 早期游牧民的西迁与东西文化交流 .....	(49)
第一节 塞人,早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者 .....	(52)
第二节 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 史上的作用 .....	(66)
第三章 中亚北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 .....	(89)
第一节 丝路北道的前身——草原之路 .....	(91)
第二节 新北道的出现及里程走向 .....	(99)
第三节 交通网络和重要城镇 .....	(124)
第四章 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及其原因 .....	(143)
第一节 公元3—6世纪的中亚形势与丝路贸易 .....	(146)
第二节 西突厥的崛起和唐朝政府在中亚北部 地区的经营 .....	(156)
第五章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	(187)
第一节 “粟特”辨析 .....	(189)

第二节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和向东的移民 .....	(193)
第三节	粟特人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 .....	(211)
第六章	6—9 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 .....	(221)
第一节	城市经济的特点 .....	(223)
第二节	蓬勃发展的多种手工业 .....	(229)
第三节	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和几种货币 .....	(242)
第四节	兼容并蓄的宗教和文化 .....	(252)
结束语	.....	(263)
重要参考文献	.....	(269)

## 插图目录

### 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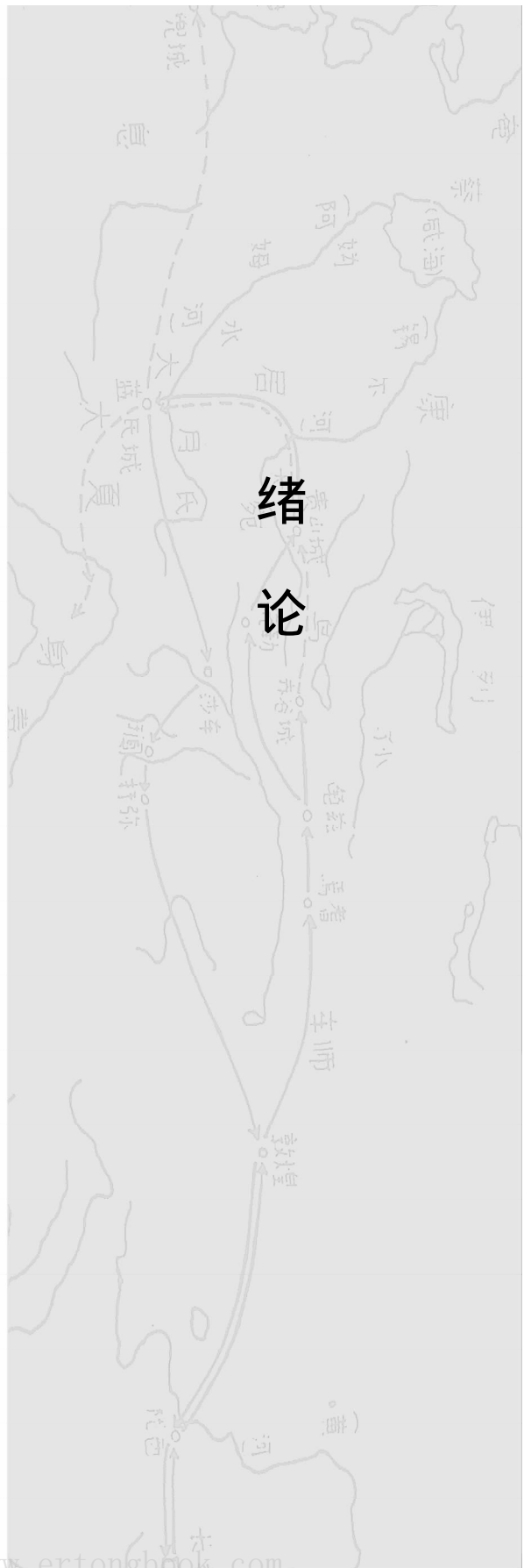
地图 1	古代文明发展与中亚的沟通作用 .....	4
地图 2	中亚与中亚北部范围 .....	28
地图 3	中亚与中亚北部地形 .....	31
地图 4	中亚与中亚北部植被分布 .....	32
地图 5	5 世纪以前亚欧民族大迁徙 .....	67
地图 6	草原丝绸之路与早期文明传播 .....	93
地图 7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	94

### 图版

图版 1	阿尔泰放牧岩画及其图案 .....	35
图版 2	巴里坤兰湾子遗址出土的环首铜刀 .....	45
图版 3	新疆境内出土的古塞人干尸 .....	58
图版 4	新疆新源县出土的战国塞人铜武士像 .....	59
图版 5	具有塞人文化风格的承兽铜盘 (天山阿拉沟出土,战国—汉) .....	59
图版 6	天山阿拉沟出土的虎形圆金牌(战国—汉) .....	63
图版 7	新源县出土的匈奴铜钺(魏晋南北朝) .....	80

图版 8	新疆昭苏县的汉代乌孙封土墓 .....	82
图版 9	天山阿拉沟口唐代烽燧遗址 .....	123
图版 10	乌拉斯塔亦石人雕像 .....	160
图版 11	新疆若羌县唐代吐蕃古城堡 .....	179
图版 12	片治肯特出土的沾染萨珊风格的粟特银壶和银碟 .....	208
图版 13	具有西域风格的唐代海兽葡萄镜图案 .....	210
图版 14	穆格山出土的羊皮纸粟特文婚约文书 .....	217
图版 15	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的汉代鸟兽纹锦 .....	238
图版 16	索格底亚那片治肯特遗址出土的中国式青铜钱币 .....	251
图版 17	高昌故城摩尼教经典残页 .....	255
图版 18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女娲伏羲像 .....	260

# 绪论



若追寻早期人类文明碰撞的痕迹,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落在地域广阔的旧大陆上:包括亚、非、欧三大洲。有别于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它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

## 一 寻找中亚,关注中亚

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让我们转到地球的这一面,仔细打量旧大陆这块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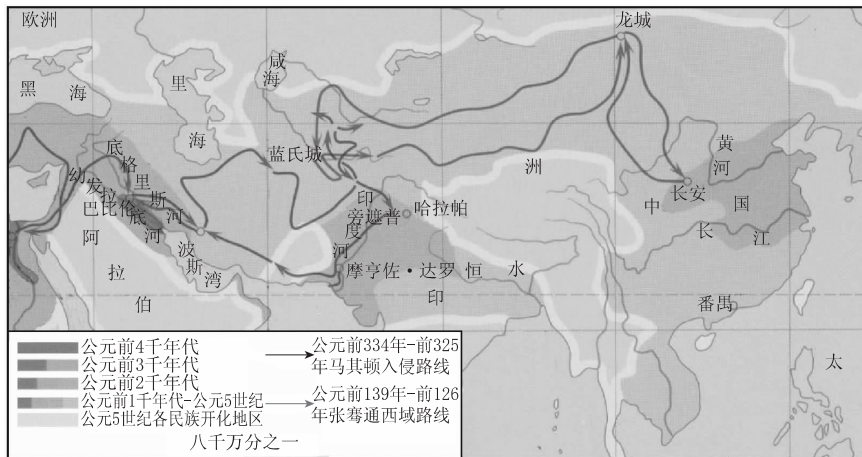
从地图 1 可以看到,在大陆东部和南部的几个大河流域,孕育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和壮观的四大文明个体,即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和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这些文明个体在地理上相隔为四大单元,由此组成早期人类文明主体。然而在这四个单元外,却是大片文明的“瓯脱”地带<sup>①</sup>,时代愈是古老,“瓯脱”地带愈是广阔。在公元前 4000—前 3000 年的时候,人类文明还局限在几条大河的中下游沿岸之狭小地带,宛若天空上的几颗星星,被浩渺的“空白地”包围着。如果联系全球化浪潮翻腾不已的当今社会,身处“地球村”的我们面对此景不禁会遐想:如此星星点点的文明区域,究竟如何相互沟通?是怎样在交流和互补中发展起来?又是怎样从如此隔膜的分离状态逐步聚合,形成当今浩大的人类文明整体的?

其实,人类文明起源的多元化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位现代学者

---

<sup>①</sup> 匈奴语,原指部落、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或边境荒地,这里代指不同文明个体之间的空白地带。

的想象。如同星星布满天空,上帝也把人类文明的火种撒遍了大自然的角角落落。考古学的巨大发展,以确凿可靠的证据不断地擦拭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界。陆续发现的各古老时代的文明遗址,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情景。他们的分布远超出了四大文明区域,几乎遍布整个大陆。尽管环境条件相差甚远,但阻挡不了他们顽强地生存和开拓。除了气候宜人、水土肥沃的大河流域,不管是森林草原,还是高山大漠,都有早期人类的活动和足迹。尽管四大文明区域的显要遮住了这些文明的光辉,但它们无疑是早期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地图 1 古代文明发展与中亚的沟通作用

资料来源: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亚欧大陆的腹地。该地区习称为“中亚”,过去也曾有其他称谓,如 19 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有称为“内陆亚洲”,或“亚洲心脏”;1829 年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亚历山

大·冯·洪堡最早提出较有影响的“中央亚细亚”；苏联学者则习惯于区分成“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两个广、狭义的区域概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以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丹尼斯·西诺尔为代表，提出“中央欧亚”的新概念；而英国和日本学界又有“内亚”和“内陆亚洲”等习称<sup>①</sup>。

由于所站角度不同，人们对其地理范围的认识也多有歧意。“中央亚细亚”指今中亚五国地区，“中亚细亚”东可起大兴安岭，西到欧洲平原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北接西伯利亚森林，南包中国西藏和伊朗高原。中国有学者则沿袭传统区分广、狭“西域”的做法，将该地域也区分成广义中亚和狭义中亚，狭义中亚系指当今中亚五国；广义中亚则东自我国内蒙古东部，西至里海，南抵伊朗、阿富汗北部及印度、巴基斯坦西北，包括我国新疆和甘肃地区，北达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sup>②</sup>。不过，各种概念和说法比较一致的是：第一，该地区以内陆河流为共同的水文特征。正如洪堡最早所界定的，将这一地区“视作与外界分隔开的一个独特地域，因为它拥有内陆水系，四周由山链环绕，探险者可以分辨出其清楚的几何图案式的体系”<sup>③</sup>。第二，它们都包括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尤以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为核心。该部分占有中亚五国主要地区，南北大致从北纬35°到50°，东西则在天山西部与咸海之间。

中亚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当复杂的地区。它由多个地理单元组

<sup>①</sup> 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考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sup>③</sup>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页。

成,地形、植被和气候等都有明显的差异。仅核心地带的中亚五国地区,就可分为沙漠、草原和山地三种类型。哈萨克斯坦(号称“中央哈萨克斯坦”)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降雨量在三百毫米左右,北部是夹杂着针叶树林的茂盛草原,“构成了从多瑙河下游延伸至中国东北的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南部则是散布着杂草与耐旱灌木丛的半沙漠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地区包括一些盆地、丘陵和平原,降水稀少,沙漠广布,在拥有一定水源的地区点缀着些许绿洲,属于自蒙古高原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沙漠地带的中间部分;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拥有着西部天山地区和部分帕米尔山系,主要是高山峻岭和山间谷地、盆地等地形,气候上相对湿润,并可得到雪山融水和河流、湖泊等水源,有山地草原和森林。此外,东面蒙古高原和东部天山地区是由山脉、台地和山谷、盆地等构成,形成草原、沙漠和山间林地相夹杂的地区。由于高大山系相隔,二者又各自形成独特的地理单元。南面阿富汗基本上是块山地,疆域的五分之四为山脉,而伊朗则以高原为主,是由高海拔的沙漠和草原构成的热带干旱草原区。向西则过渡为渐受大西洋暖流影响,相对比较湿润的温带草原地区<sup>①</sup>。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地形复杂,有高山,有沙漠;气候恶劣,或干旱,或高寒;植被稀少,物产单薄,与文明主体区域相比,人类生存和活动艰难。然而考古研究表明,这里依然有人类早期文明的存在。早在数十万年前,中亚各地就有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从锡尔

---

<sup>①</sup> 以上参考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等。

河上游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这一地带文化遗址的分布尤为集中<sup>①</sup>。而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亚文化遗址就更为密集。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众多的文化遗址则构成了中亚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介于四大文明区域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早期人类文明沟通和交往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和媒介。以中亚为基点,往东靠近构成东方文明核心的中国中原文化密集区,往南毗邻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区域,往西南则通往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区域。在人类活动能力极其有限的远古时代,各文明区域只能就近接触其他文化,与相毗邻的文明个体沟通和交往。这样,中亚就成为能够与各主要文明个体直接沟通和交往的唯一地区。基于这一点,远古时期文明主体单元之间的沟通大都经过中亚地区的文明个体而进行。嗣后,伴随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横贯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作用逐步凸现出来,并逐步构成枝干蔓延、襟带相连的交通网络。历史上无论是草原丝路还是绿洲丝路,各主干线无不以中亚地区的草原、绿洲和山口为必经之路。在东、西方之间,民族的群体迁徙、商贸物质的运输以及使者和僧侣的旅行,也必须在中亚地区的草原或沙漠中穿行。如果从丝绸之路发生史来考察,在丝绸之路全线通畅之前肯定会有局部交通的充分铺垫。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中亚及其庞大帝国的建立,使丝路西段的商道达到一定繁荣;而张骞出使西域则使

---

<sup>①</sup> 例如,锡尔河上游的库尔布拉克遗址所发现的阿舍利文化距今有70—50万年;在巴基斯坦西北索恩等地区竟在20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包括一件石核石器和若干石片石器的一组制品”;甚至在阿尔泰山北麓也发现了距今148万年左右的文化遗迹。大致在距今25—13万年,塔吉克和阿富汗洼地一带达到“原始人类最为繁荣的阶段”。(参考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第2章)

中亚与中原之间的了解和往来迅速扩展。多个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蔓延,要么发源于中亚,要么以中亚为中转站,可见中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最大桥梁和枢纽。为此有学者指出:“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sup>①</sup> 尽管中亚一带没有发展成像四大古文化区域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它却以不可替代的中介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 二 关于中亚史的研究

尽管中亚不属文明发达区域,但是人们对该地区的认识却很早就开始了。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多卷本的论著《历史》为代表,西方世界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注意到其文明“边缘”以外的中亚民族。在书中,希罗多德最早将中亚居民区分为:北部游牧民族,主要有锡尔河以东的塞种人和咸海以南的玛萨该塔伊人;南部绿洲上的定居民族,则因地名而称之为索格底亚那人、花刺子模人等,甚至还提到中亚东北远至阿尔泰山地区的秃头人和独目人。在许多罗马作家的地理志和史著中,西方人原以为是丝绸生产者的那些“长着蓝眼睛,红头发”的塞里斯人,其实并非中国人,而是中亚地区从事居间商贸的民族或部落。强大的波斯、阿拉伯以及

---

<sup>①</sup>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序,第1页。

突厥帝国曾经长期占据或控制过中亚地区,因而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对中亚有着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大量的波斯和阿拉伯文献对中亚的地理、民族和风土人情都有过细腻而准确的叙述。特别是阿拉伯人,他们对中亚认识的深度和水平几乎超过了中亚以外任何其他地区的民族。其地理志书,如伊本·库达特拔《道里邦国志》、马苏第《黄金草原》、埃德里记《诸国风土记》、雅库特《地名辞典》、卡兹维尼《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阿布尔菲达《地理书》、伊本·瓦尔迪《奇迹书》等,都对中亚地区的道路里程、风土人情物产等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在丝绸之路另一端的中国,也很早就认识到中亚这片世界的存在。立足中原,中国史家习惯把包括中亚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称为“西域”。反映先秦地理观的《穆天子传》,以浪漫的笔调初步描绘了这里的地理和民族。而《史记》和《汉书》则因张骞出使西域和汉朝对西域的开拓与管辖,留下了大量真实确凿的记载。以后历代中原王朝不断加强着与西域的往来联系,络绎不绝的行旅,包括使者、商人和僧侣也越来越多地深入到中亚腹地。各部正史中的西域传、西戎传等,各地理图记(如隋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佚名《隋西域志》、《西域道里志》等,唐高宗朝官修《西国志》、《唐西域图志》、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中有关西域的介绍,以及大量私人游记(北魏宋云《西域行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王玄策《中天竺国记》、韦弘机《西征记》、慧超《往五天竺国记》、杜环《经行记》等)对西域的描绘,使人们对穿越中亚的交通道路的认识逐步清晰和细致起来。总之,古代中外文献为后来人们深入研究中亚史地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9世纪,中亚地区成为英、俄等列强争夺的对象,由此更凸现

其重要地位。大致从该世纪中叶起,英、日、俄、德、法、美、瑞典等国政府开始陆续派人深入中亚进行实地调查,西方探险家们纷纷涌进中亚腹地。在探险和考察过程中,亚洲腹地大量的文化遗址、珍奇的历史文物和丰富的古文字史料不断被发现,从而激起了诸多东方学家的研究兴趣,一股“中亚热”迅速兴起。最初是德国地质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和费迪南德·李希霍芬等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调查和研究。早在 1829 年,洪堡就沿西伯利亚到里海长途旅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地理范围和环境作了深入研究。他所采用的“中央亚细亚”这一专业术语及其对中亚地理界限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李希霍芬先后七次在欧亚腹地旅行考察,他敏锐地把中亚地理与东西文明交流联系起来,原创性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丝绸之路”一词。接着瑞典人斯文·赫定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对亚洲腹地进行了多次探险考察,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还成功主持了瑞中联合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时八年的科学考察。他在考察中所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引起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再度热注。自 19 世纪末叶起,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对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先后进行了四次探险,重点考察了从葱岭到塔里木盆地两缘乃至河西的丝路交通和重要古城镇遗址。法国人伯希和是考古学家兼东方学家,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将中亚史和丝绸之路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面。

沙皇俄国因扩张疆土的急切野心表现出对中亚探险更高的热情。仅在 18 世纪下半叶,就先后有普尔热瓦斯基、科兹洛夫等人多次深入中亚,其足迹远及新、甘、青、宁等地区。后又如愿以偿地把中亚广大腹地逐步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因此也方便了俄国学者对中亚史地的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俄国学者在中亚史的研

究领域里游刃有余。到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学者们将中亚史研究又不断推向新高度。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城市,如塔什干、阿拉木图、伏龙芝等地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并涌现出一大批中亚史研究专家,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史地及考古学专著,从而使中亚史研究成为国际学界为之瞩目的一门显学。在苏联时期,学者们对中亚及外蒙古地区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考察活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物和学术资料。他们对中亚史地的研究深入而系统,特别是在中亚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学以及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权威性成果,如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均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19 至 20 世纪,法国和日本对中亚史地的研究也有相当突出的成就。法国自 1822 年起就先后成立了法国亚细亚学会、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以及法国汉学研究所、突厥研究所、蒙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涌现出如沙畹、伯希和、儒莲、格鲁塞、布尔努瓦等著名学者,发表了如沙畹《西突厥史料》、《宋云行记》,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汉书·西域传注》,儒莲《回鹘史料》、《大唐西域记》,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玛雅尔与埃迪旺·尼古拉合著《中亚的石窟与遗址》、玛雅尔与韩百诗合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等权威性专著。其中格鲁塞对中亚和草原地带的研究最为专注和充满热情,他的一系列论著如《从希腊到中国》、《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以及四卷本《东方的文明》等,代表了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法国中亚史和北方草原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日本学者在中亚史的专题性研究上尤为突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丝绸之路文化史》,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之研究》，安部健夫《西突厥国史研究》，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亚细亚文化史研究》，护雅夫《古代游牧帝国》、《中国文明与内陆亚细亚》，水野精一《西域》，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中亚史》，岛崎昌《隋唐时代的突厥斯坦研究》，增天精一《为沙所埋的丝绸之路》，保柳睦美《丝绸之路地带的自然变迁》，井上靖《亚历山大之路》等，反映了 20 世纪日本在中亚史某些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

近数十年来，特别是中亚五国脱离苏联、宣布独立以来，中亚地区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一股新的“中亚热”。此时国际学界在中亚学研究领域上不断拓展，由最初的地理交通、文物整理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宗教、艺术、习俗等方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有：地理和考古文献领域出现了赫尔曼《公元 1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罗马之间的交通路线》，亨廷顿《亚洲的脉冲：西域历史地理图解日记》，瓦尔德施密特《犍陀罗—库车—吐鲁番》，达伯斯《中国新疆的发现和考察史》，冯·加班《大草原与城市》，哈格《通向亚洲之路》，包伊斯《中世纪伊朗语摩尼教遗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齐莫《景教突厥文吐鲁番文献》、《摩尼教突厥文文献》，斯米尔诺娃《粟特钱币》等新成果，亨宁《粟特文古代信件断代》、《巴黎的粟特文献》、《大夏语铭文》、《呼罗珊文献》等表现其在考古文献方面涉猎尤广。政治史领域有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纲》、豪西格《伊斯兰之前的中亚史和丝绸之路史》、葛玛丽《850—1250 年间的和卓回鹘王国》、哥尔久《古代中亚的国王、可汗及其他统治者》、